

光大烏龍證中國股市脆弱

易憲容

局長隨筆

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很值得觀賞的展覽正在舉行，那就是名為「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的展覽。香港的演藝節目有大量清裝戲，其中佔了不少是所謂宮廷戲，電視、電影、粵劇、話劇都不乏這類作品。清代宮廷的真實服飾是怎樣的，去看看上述展覽就清楚了。

展覽琳瑯滿目

這次展出的服飾達130多套，這麼多真正來自清代宮廷的服飾，不可能是一般博物館的藏品，只可能來自北京紫禁城、著名的故宮博物院。據知，故宮博物院的織繡文物達18萬件，這次來港展出的服飾是自其中精挑出來，當中包括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和溥儀等在不同場合穿的服飾，有十件更是國家一級文物。

這樣一個展覽，可以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去欣賞。你可以純粹去欣賞清宮服飾高起的繡造水準。愛讀《紅樓夢》的人可能知道，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世代經營江寧織造廠，為皇家服務，頗受寵信。家道從繁華到沒落，據信是曹雪芹寫出《紅樓夢》的背景。這一夢，很大程度上是織出來的。展出的某些服飾說不定與這一夢有關聯。

展覽又反映了清宮嚴謹的衣冠制度與等級觀。服飾是重要的文化載體，歷代被視為禮儀的重要部分，通過服裝的形制、紋飾、顏色及用料等，反映穿著者的身份等級、社會地位。清代服飾制度之龐大浩繁，超越了中國以往所有朝代，而宮廷服飾又是當中最為複雜嚴謹的，在中國服裝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展出的包括有禮服、衣服、皇后妃嬪的便服，以至王子幼童的穿著等，每件服飾背後都會有一段故事，引人聯想。這些服飾的設計大量吸收了漢族文化，因而也折射了漢漢文化的融合，可作為了解多元中國文化的切入點。「國采朝章—清代

宮廷服飾」展覽可謂琳瑯滿目，有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實不容錯過。

尚有多個合作項目

算來，這已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在香港合作舉辦的第五個展覽，從2000年起，每兩三年就有一大批故宮博物院的重要藏品獲借運到香港亮相，讓香港市民和從各地到來的遊客大開眼界。很多展品是你即使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未得見瞻仰風采的。

取得多次經驗之後，我們去年更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合作意向書》，從而建立了暢順的機制。這次展覽，是繼去年在香港藝術館舉行的「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展覽後，雙方在《合作意向書》框架下的另一個合作項目，也是香港歷史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第一個合作展覽。

接著，還有多個展出計劃在籌辦。可以預告的包括：「皇家茶具精品展」（在茶具文物館舉行），「皇家廚房」（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西洋奇器」（在香港科學館舉行），「故宮博物院藏鐘表珍寶展」（在香港科學館舉行）。這幾個展覽都頗有趣味。

故宮博物院是中華文物、文化的寶庫，藏品很多，能夠輪流展出的只是極小部分，所以如今準備在京城北面新建

附屬展館，增加展覽空間。有識之士曾經建議在香港籌設故宮博物院的分院，一如法國羅浮宮在朗斯設立分館。朗斯是法國北部一個三萬多人口、衰落中的煤礦小鎮，去年底分館開幕時，羅浮宮館長羅赫特說其考慮是「到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朗斯與香港固然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有多所具規模的博物館，我們期望與故宮加強合作，讓中華文化歷史瑰寶的光輝可以通過香港這個窗口，折射到全世界。

故宮珍寶源源到港

民政事務局長 曾德成

名家指點



8月16日 早上11時05分，上證綜指突然在短促的兩分鐘內，由2074點急升至2198點，股市上漲達5.9%以上。

股市指數突然的飆升，先是市場謠言滿天飛，傳出政府將推出多種激勵股市繁榮之政策，比如貨幣政策寬鬆、交易制度改革、優先股試點方案實施等，甚至於傳出上海交易所系統出問題等。

之後，光大證券證實該公司策略投資部門自營業務在使用獨立套利系統時出問題，即該部門做量化投資的一個ETF套利產品時發出錯誤指令，將3000萬股錯寫成3000萬手，即刻引發ETF基金自動購買成分藍籌股及其他程序化交易的資金迅速跟進，銀行石油等大藍籌股即時大漲，上證綜指也即刻飆升，同時，也使得內地和香港的指數期貨合約成交急增。

當股市冷靜平穩下來之後，上證綜指不升反跌，內地A股與香港恆生指數最後以跌市收場。在當天下午2時25分，光大證券發布公告，證實該行交易系統出錯。中國證監會發言人於4時30分證實，是光大證券錯盤導致大市波動。不過，上海交易所

則宣布，該事件所有完成的交易將正常交收。

缺乏防險制度安排

儘管這次股市的烏龍事件看上去是一次技術性的錯盤交易，主要是當事人技術性錯誤操作的結果，但是它不僅是中國股市20年來所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技術性事件，也暴露出內地股市所具有的嚴重脆弱性、股市防險風險機制嚴重滯後、信息披露機制嚴重不透明和功能嚴重弱化等。

近些年來，由於內地股市的全面衰退及無效率，在競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證券公司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生存越來越困難。為了生存，內地證券公司無所不用其極，或採取所謂創新的方式尋求生存空間，所謂ETF套利產品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對於內地證券公司來說，為了生存，就得千方百計去學習所謂先進的交易工具，而不管中國市場是否有這樣的條件，有沒有防範風險的制度安排。而實際上，內地股市是沒有這些金融工具防範風險的制度安排的。

近年全球股市錯盤交易屢有發生，它給市場帶來的巨大風險早就為各國監管層所關注，全球不少交易所都在逐漸採用市場防險機制。比如，在香港交易所，若在證券交易過程中出現報價畸高或過低，或交易數量過多的落盤，交易系統都會有特別警示，要求交易員重新核實。如果內地證券交易所也有類似的預警機制，那麼這次光大錯盤的烏龍事件發生的概率就會

降低。這樣平常的事情，內地證券市場為何沒有設立預警機制呢？很大問題就在於監管部門相應的風險意識十分薄弱。

信息披露機制存缺陷

另外，由於內地股市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股市的基本功能全面弱化或喪失。比如，由於內地股市是一個完全「圍錢」的市場，IPO一直無法啟動。這不僅讓不少好企業與行業無法進入市場融資，推動一些新興產業或行業發展，而且也導致內地金融市場結構嚴重失衡，影子銀行盛行。還有，內地股市賺錢功能的喪失，也使得投資者紛紛離開。我們可以看到，自2007年10月以來，上證綜指從高位狂跌，市值嚴重蒸發，凡進入股市的投資者個個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就這幾年的情況來看，內地股市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大。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豈能不落荒而逃？如此敗落慘重，就使得證券業更為衰敗，內地證券公司只能以更多創新的方式來生存。

再就是，光大證券烏龍事件發生之後，市場上的謠言為何會滿天飛？這只能說明股市信息披露機制存在嚴重的缺陷。由於許多信息不公開、不透明，容易造成股市內幕交易嚴重。有任何風吹草動，市場都會理解為內幕信息的異動，許多投資者都希望利用這種市場信息披露機制存在嚴重缺陷來操縱市場謀利。正因為信息披露機制不公開透明，也就為少數投機炒作

者操縱股市創造了條件，從而嚴重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有人分析，從該烏龍事件來看，只要有20億資金就可對股價舞高弄低，上下其手操縱市場謀利。這些操縱市場的行為是否得到有效監管，是相當不確定及困難的。

應做全面檢討

最近證監會主席肖鋼直言不諱地指出，在當前的制度結構下，不僅市場容易嚴重侵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而且證監會要想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也十分困難。因為，中國股市重大改革面臨重重阻力與困難。我們可以看到，內地股市違法案件越來越多，2009至2012年，案件增幅年均14%，2012年同比增長21%，2013年上半年同比又增加40%。這些都是與目前內地股市制度改革嚴重滯後有關。總之，內地股市的脆弱性是十分明顯的。這次光大證券所導致的烏龍事件，更把風險防範的嚴重脆弱性暴露無遺。

昨中國證監會表示，會立案調查事件。政府監管部門不僅要查清事件的前因後果，給市場一個清楚明確的交代，還得嚴查事件中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並嚴肅追究相關當事人的責任。當局還得對事件進行全面反思，檢討內地證券市場的風險防範機制，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重大制度改革，以此來重新煥發股市的生機，否則，內地股市要走出當前的困境是不可能的。

參政議政

社會趨兩極化 難為警務人員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

香港社會越來越兩極化，很多事件都由原來的善意，一路發展向兩極發展，到最後激化成為對抗。近日，林慧慈事件由她違法地走進警方已圍封的區域引起，繼而一句粗口辱罵警員，再有人將片段上載於互聯網，並揭露林慧慈父親的政治背景，最後演變成數千人聚集於旺角行人專用區互相指罵。

事件由一開始的關乎教師道德操守、尊重警方執法權力，最後演變成對政治上的指罵。這些無謂的對立、對抗、指罵，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有何幫助？對反思教師應具的品格操守有何幫助？對警方執法權力的尊重有何幫助？實際上，香港警務人員是政治中立、是維持香港秩序的執法者。他們要維持政治中立，亦要維持香港社

會應有的運作和秩序，保障市民應有的集會和言論自由。他們要在幾個原則中，找出平衡點，在一個數千人聚會場合下，要冷靜作出平衡各方需要的判斷，殊不簡單，他們還要準備有可能在事後受到斥責。

香港社會究竟需要的是對抗對罵，還是需要對話商討？對抗、對罵只會令社會內耗，令社會成本無謂地流

失。對話、商討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是妥協、平衡不同聲音的方法。

筆者希望社會各界盡快恢復和諧，放下對抗、對罵的心態和行動，重回協商、對話，以理性務實去解決社會不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尊重政策的執行者，他們是服務我們的公務員和警務人員，別將不滿發洩在他們身上。

來論

從《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想到梁振英

蒯轍元 馬建波

行貸款。對此，朱鎔基表示，「梁先生講了很多意見，講得很好」。他指出，香港、新加坡解決房子問題，基本的方法都是國家、企業、個人一起來，上海一定要訂一個國家、企業、個人一起上的辦法來解決住房問題。他建議把上海有關部門召集起來，請梁振英做個報告，並選派一些人到香港培訓，學習土地批租和開發房地產市場的經驗，此外還表示「今年（1990年）6月份，我到香港去時再向梁先生登門求教。」

可見，青年時期的梁振英就是一個有心人，是一個關愛香港，情繫祖國的有志青年。他已將自己和香港未來的命運，同祖國的改革開放緊緊聯繫在一起，並積極投身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內地，獻計獻策，深圳、廣州和上海都留下他青春的足跡。這也就不難理解梁振英的競選政綱和成功當選後及時推出的各項經濟政策，皆立足於解決基層民生與社會經濟調發展的根本問題（土地規劃、房屋供應、房價調控、醫療衛生和經濟轉型等），如：全力增加土地供應，取消勾地機制，收回土地定價權；部署開發大嶼山，新界東北和東涌，以拓展經濟地理空間和改善民衆居住環境；及時推出雙軌制（SSD和BSD）有效遏制樓市泡沫和炒風的蔓延。梁振英當選特首以來的作為，與他青年時期立下的志向和多年實踐經驗的累積是分不開的。因此，他是有心為香港謀劃的，是有準備的，正所謂「立志有為，而歷練能為」。

梁為順利回歸貢獻良多

梁振英1954年出生在香港一個底層家庭，從祈李活道養正小學到英皇書院，一直靠品學兼優申請獎學金苦讀下去。後考入香港工業學院（現香港理工大學）拿到建築測量系高級文

憑後，梁振英靠姐姐賣寶嫁妝和自己在外賣店兼職打工賺到的錢，在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攻讀估價及地產管理學位。1977年，梁振英返回香港加入仲量行，30多歲已經被擢升為該英資大行中最年輕的合夥人。作為一名專業測量師，梁振英與其他20多位香港專業人士一起，連續多年免費為深圳特區「拓荒者」介紹香港及西方經濟、法律制度的正反面經驗，講授專業制度。梁振英主要負責向內地介紹「土地經濟、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規劃」等內容，講課的範圍很快從深圳擴展到上海。梁振英先後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顧問、上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顧問。

1985年，梁振英伴隨中英談判的步伐踏入香港政壇，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為180名委員之一，後來又獲選為19名執委之一，開始了迎接香港回歸祖國的偉大實踐。此後其歷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行政會議召集人，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委員兼政務小組組長、籌委會副主任以及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88年，全國人大修訂憲法，第十條允許土地制度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與梁振英向內地介紹香港土地制度的努力不無關係。同年，梁振英參加了上海第一次公開招標賣地的標書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並參加了在上海開始的大規模的住房制度改革。

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關鍵時刻，梁振英說服中央接受他的意見「毋須業主拿出大筆錢補地價，而以徵收新地租的方式，解決了1997年後香港界限街以北，全新界九龍房地產年期在1997年到期後怎樣續期的大難題」。

這份意見書，交到港澳辦手上，最後成為中方意見，成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關於土地契約》的主要

內容。因此，梁振英為中英談判的順利進行和實現香港的順利回歸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回歸後從政多年

1997年7月香港回歸後，至2011年9月，梁振英擔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政府核心決策機構）成員，協助行政長官進行施政綱領和經濟方針的決策。1999年7月1日升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進入特區政府決策權力的核心。30多年來，梁振英一直都在從事關心香港前途和命運的工作，傾注了很多心血，融入了深厚感情。曾有記者問他：當您看到「改革開放」、「30年」和「香港」這三個詞彙連在一起時，讓您最先想到的是什麼？香港走向祖國懷抱和內地走上改革開放這兩條線，是如何互相推動的？

梁振英這樣回答：「我最先想到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感。我們這一代人，不管在香港或內地出生，成長過程中，都有強烈的歷史感和難得的歷史機遇。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在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中，接觸到百多年來中國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復興所作的犧牲和努力，也在當時的報紙和雜誌中，接觸到國家的落後和動蕩。我們在1970年代末離開學校，事業開始就碰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為我們帶來的極大機遇。這個機遇不僅是個人發展事業的機遇，更重要的是為國家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的機遇。我在英國留學時的同學當中，不少人在1970年代中後期到中國駐英大使館打工，希望有機會到內地服務，這些同學都是唸自然科學的，當時內地條件不具備的，不僅是生活條件，科研條件和政治條件都不具備，最後只有一兩個同學成行。我唸土地經濟，懂點房地產，當時內地沒有私有土地產權的概念，政治上也不允許，因此，我是無

用武之地，對唸自然科學有機會往內地做科研的同學很羨慕。因此改革開放初期，知道香港有人組織了『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經常到內地講課，也需要我這種人，對我來說，是一償心願。能夠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同時為國家的發展出力，取得一些成績，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機遇和光榮。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的發展，是互利互補的良性互動。通過借鑒香港的部分制度、政策、技術和文化，內地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取得快速的發展，而由於內地的發展，香港的回歸有了更好的條件。我經常說1997年香港回歸時，如果當時內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停留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水平，香港回歸後維持穩定繁榮的目標必定遙不可及」。為此，梁振英還組建了「『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他曾說，「百多年的歷史問題、香港幾十年的前途問題，均以和平手段順利解決，足以在歷史上大書一筆。」在梁振英的辦公室裏掛着兩幅地圖，一幅是香港，另一幅是深圳和珠三角地區。他說要研究香港，就必須充分研究它的地理關係，也就是與深圳、與內地的關係。

由此可見，梁振英在當選特首之前已從政多年，深知香港社情、民情和政府的行政運作。同時，他對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及香港未來的發展定位，有着清晰深刻的認知。內地的改革開放與香港的順利回歸是密不可分的，內地的經濟發展與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是相輔相成的。因此，香港的未來就在於同大中華經濟圈的深度融合與產業重建。香港需要一種突破傳統機制與僵化思維的變革，需要穩中求進的持續發展，香港的希望在於港人團結一心的實幹，而不在于富商的肩。當時的梁振英已看到和看準了這一點，這是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是

一種眼界，一種胸襟和一種氣魄。也許這就是他成功當選香港特首的履歷和資本。

請給特首改善施政的空間

然而，自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履新第四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以來，施政道路並不平坦。由於多年民生問題和深層矛盾的累積，泛政治化思潮氾濫和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等因素影響，許多經濟施政和民生議案被「泛民」議員以「拉布」行動不斷阻擾，難以順利落實。加之，新政府問責團隊履新一年來，又出現參政和張震遠等個別問責官員的誠信危機，使政府問責團隊的誠信受到衝擊。面對2017年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期的臨近，反對派更借機挑動內耗，激化矛盾，攻擊特首。一些前政府高官也不顧大局，說一些不負責任、不切實際、不利於團結和挑起內部矛盾的話，將責任和矛盾的焦點都推給梁振英特首，企圖製造內部的分裂。殊不知在香港目前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生態下，不管是誰坐在特首位置上，都須面對這樣的困局。

儘管矛盾尖銳，阻力重重，但梁振英團隊仍克服困難，迎難而上，施政一年，推出多項確實有效的利民利港的經濟政策，壓抑樓價，舒緩通脹，拓展經濟。

今年以來，反對派提出「佔領中環」行動，企圖以「公民抗命」的違法方式，否定「基本法」的神聖地位，破壞香港特區循序漸進的政制改革，陷香港於無政府狀態。因此，究竟是「誰在坑害香港與誰在愛護香港」已經一目了然。我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需要的是真正關心香港未來和努力改革實踐的特首；而不是滿嘴政治口號與文革式鬥爭鬥爭的空談政客。因此，是歷史選擇了梁振英，香港需要梁振英。香港社會應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應多一些理性的聲音，應給這位勤力務實的新特首多一些施惠與責任的機會，多給新特首一些強化團隊和改善施政的空間。